

中国民族纪实影像书系

王天玺 主编



马背上的游猎生涯

——鄂伦春族纪录片图集

蔡家麒 编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民族纪实影像书系

王天玺 主编

刘大伟 郭净 副主编

马背上的游猎生涯

——鄂伦春族纪录片图集

蔡家麒 编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背上的游猎生涯:鄂伦春族纪录片图集/蔡家麒
编著. —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222-11734-1

I. ①马… II. ①蔡… III. ①鄂伦春族—民族文化—
中国—图集 IV. ①K28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8065号

出品人:刘大伟

责任编辑:尹杰

王曦云

装帧设计:王曦云

责任校对:博林

责任印制:洪中丽

书名 马背上的游猎生涯——鄂伦春族纪录片图集

作者 蔡家麒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0.75

字数 160千

版次 2014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11734-1

定价 28.00元

如有图书质量与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0871-64164626印制科电话0871-64191534

总序

王天玺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现在有56个民族，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灿烂的历史和绚丽多彩的文化。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民族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使辽阔的中华大地闪耀着斑斓璀璨的多元文化的光辉。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型民族关系的构建成为新中国国家整合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民族问题，制定了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民族政策。为了正确执行这一政策，推动各少数民族的发展，中国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组织大批学者和工作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的调查，参与者有诸多国内著名的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家。其间，作为一种记录手段，电影首次在中国被大规模地运用到田野调查中，这次拍摄工作，有大批民族学者、摄影专家和当地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参加。其规模之大，涉及地域之广，时间之久，中央及基层各级政府支持力度之强，在国际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从1956年至1964年，历时8年的“民族大调查”，不仅获得了大量有关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民族语言的丰富资料，也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研究成果。其中，除“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外，那就是运用电影记录手段，直接参与到民族调查的田野实践之中。制作完成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有《黎族》《佤族》《凉山彝族》《苦聪人》《独龙族》《景颇族》《大瑶山瑶族》《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鄂伦春族》《赫哲族的渔猎生活》《西藏的农奴制度》《西双版纳傣族农奴社会》《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傜人》等20余部。这些影片系统地记录和复原了我国少数民族民主改革前的历史和不同类型的社会形态，为当时党和政府制定有关少数民族的方针政策，为研究和教学，为普及社会科学知识，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提供了形象化的科学依据。

这批纪录片开创了具有中国民族志电影特色的新片种，为后人留下了反映那一时期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史的第一手资料，是我国多民族影视文化的宝贵遗产。当年，周恩来总理在看完《佤族》《凉山彝族》和《黎族》等影片后说：“搞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拍这样的片子是对世界的贡献”（《光明日报》，1987年2月25日）。半个世纪以来，这些纪录片的吸引力经久不衰，也深得国外同仁们的肯定与赞赏，他们认为中国的民族志纪录片是极有价值的，它丰富了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影视文化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珍贵的民族志纪录片，其学术价值、文献价值、实用价值和社会影响，将愈益彰显。

值得一提的是，多年前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们曾提出建议：为了有效地保存与影片有关的文字档案，应将这批民族志纪录片的拍摄提纲、分镜头本和影片完成台本选编成册，出版发行，以便于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研究时参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秋浦和民族学研究室主任詹承绪，副主任曹成章、满都尔图，研究员吕光天的积极支持鼓励下，杨光海等前辈经过几年的收集整理，编选出了《中国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文本汇编》。这项工作，开启了收集整理中国民族志电影文献资料的先河。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文化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大批民族研究机构，民族院校、民族地区的文博部门、电视台甚至个人，为了科研、教学、旅游、文化宣传的需要，投入了民族志电影的制作和研究，由此引发了人们对民族志影像的关注。在国家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要建设文化强国，我们以文化自觉的心态，在云南省民族文化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下，积极策划了这套“中国民族纪实影像书系”，旨在发布收集、整理、研究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和民族志摄影的成果，使之以纸质载体的形式流传于世，满足社会各界人士的需求，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在“中国民族纪实影像书系”出版之际，我们深情怀念最早提出编写本丛书想法的已故汪宁生教授和刘达成研究员，并向当年开创民族志影像的先驱者，谨致谢意！

目 录

前 言	1
卷 首	7
去朝阳途中	9
冬 猎	19
枪支 马匹 “阿那格”	25
猎装 夜宿 分配	35
迁徙 “仙人柱” 仓房	49
猎鹿 捕鱼 “打蚊烟”	75
采集 农耕	95
手工艺	103
“安达” 婚姻 分娩 儿童	123
氏族会议 占卜 丧葬 萨满教	141
后 记	165

前 言

所谓“图片”，此处主要指实地拍摄的纪实性照片。许多照片往往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存史的价值，因为世间的人和事经常处在变动中。人在变化，事物也在变化，社会和自然界更是在不断地变化。这个变化的过程，可以说就是历史。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自然的和社会的情境下，以及一定的事件中，被定格下来的照片，就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图片的价值正在于斯。图片真实地记录和见证了人一生中的变化、社会和自然界的变迁、事物的各种变化及其过程等。通过图片提供的影像，能促进我们认识过去，思考、探索这些变迁的种种特点与原因或者经验教训，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今天的生活，创建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这就是图片研究的意义。

运用图片分析研究社会历史和文化常会涉及“图像学”（Iconology）。该词由希腊语“图像”演化而来，缘起于19世纪欧洲艺术史的“图像志”（Iconography）研究，主要是对美学、艺术理论中内容与形式关系的研究。19世纪下半叶，法国学者E.马莱最先提出“图像学”的概念，将它视为历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专注于文献里的图像研究。这一时期图像的载体，主要是静止的艺术绘画。20世纪以来，由于现代科技的发达，图像志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开始由“艺术”转向“文化”，并与其他学科联系日益紧密，发展成现代的“图像学”，图像的文化内涵超越了传统概念中关于审美和艺术问题的界定。图像是视觉的，具有区别于文字理论的独立价值。图像的意义在于它是人们传播、交流思想和获取信息的主要媒体方式之一，即从“语言文字”转型为“图像”（W.Hofmann）。有学者认为“观看先于语言”，“语言文字实际上无法充分阐释视觉经验”（John B.）。现代的“图像”已经转为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的主要媒体形式（“百度网”资料）。其研究的载体，主要是经摄影制作出的动态影像。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采用了图像学的一些原理，衍生出今天的“影视人类学”（视觉人类学）（Visual Anthropology）这

门分支学科。

我国学者何平认为，“图像学”的原意是研究图像的主题、传统、象征意义及其与社会文化事件关系的学问。韩丛耀认为，记录历史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语言文字为主要载体的线性的、历时的、逻辑的记录方式，属于比较主流的方式；另一种是以图形、影像等结构性符码为主要载体的面性的、共时的、感性的描绘方式。认为表述和记述世界的不只是文字，还有图像。（薛倩：《图像学为理解当代文化提供新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8月27日A-02版）随着摄影设备与技术的精进，作为一种表意的符号，图像或影像是记录、描述和诠释历史与现实的一种方法，图像学提供了理解社会历史、文化与人类行为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的一种新型学科。

在发现和论及“图像”的重大作用与意义的同时，我们不可以片面的贬低甚或排斥“语言文字”的作用与意义，二者在表述和阐释上虽有质的不同，但各有优长与局限之处，它们的特殊功能不能彼此全然取代，特别是在揭示图像背后隐藏着的深层次的事物时，尤其需要运用语言文字。一般讲来，照片记录的事实自有其客观性，不容更改，而文字记录的事实往往限于一定的主观性，可以更改；照片是通过自身的事物说话，文字可以超越事物说话。但是涉及到两者的所谓“真实性”的问题时，常常成了仁者智者的争论了。只有正确地理解它们的性能和运用它们，将图像和语言文字有机地结合使用，发挥各自的特长，让二者在表述和解释客观世界时因其互补而相得益彰，能够清楚地展示出更多更为复杂的事物，这正是我们需要努力去做的。

作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影视人类学”，多着眼于研究当代社会和文化的特征及其变迁中包括人们的行为等一些带有普遍性或规律性的东西，往往采用文化比较的方法或跨文化比较方法来历时地、同期地进行纵向或横向地观察判断、分析研究民族或族群内部以及彼此之间的社会文化各自的特性、模式和事物在变迁中的某些具有共同性与特殊性的问题，所以图片本身及其背后所反映的、深藏着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因素，是其主要的研究项目之一。

值得提及的是1936—1938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M.Mead和G.Beteson在印尼巴厘岛做的田野调查，他们现场拍摄了22,000英尺的影片资料和25,000张

照片，50年代初期，M.Mead从这些照片中精选出759张，按主题和相关细节编成图片集出版，每张照片都有详细的文字说明，特别注重照片中反映的事物的背景性解释，从而开启了人类学图片研究的方法。

长时期以来，在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们多习惯于重视和依靠被观察对象的口述和回忆，比较忽视眼前正在进行着的社会文化事实的影像搜集与记录，这在过去可能是受到影视技术不普及的诸多条件的限制，因此，他们的工作常局限于仅仅用文字符号来记录和表述的一种地地道道的“口头科学”（M.Mead）。二战以来，随着声像录制技术的发展，田野作业从根本上改变了那种仅依赖于口头和笔头的并不准确完善的记录与表述方式，通过声像的现场连续记录，这就为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了直观真实而且可以反复重现的鲜活形象与活动的场景，并且能够永久保存还可以加以复制的那些业已消失或正在逝去的社会文化事实。显然，运用影视技术的手段，采用现场直观式的声像记录，比起书面文字资料要准确生动得多，其传播速度与传播层面也远胜于后者，它对于更准确更精细的观察事物和扩大田野作业的视野，尤其是深化人们的认识，具有特殊的意义。

照相的技术发明于19世纪的西方，那个时期留下的影像资料，可以探知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比如，作为一种文化的服饰同社会环境的关系，图片能够予以说明。清末民初，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城镇男性知识阶层、官员和商人等的服饰，趋向于一种比较标准化的样式，他们在一些较为正规的场合里，都习惯于穿大襟长衫，外加对襟深色马褂，所谓“袍子马褂”，头戴西式毛呢礼帽，而不是传统的“瓜皮帽”，脚蹬尖头皮鞋，而不是黑布鞋，有的手握“文明棍”以示身份。这种时尚装束，可以从许多家庭、会议和个人的旧照中看见，明显地反映出旧时东西方文化的一种结合。再有，服饰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在图片里也能得到揭示。我见到过一张摄自西藏察隅县山区从事游耕和狩猎的僜人的民族服饰，一个成年男子身穿牦牛毛粗织的短衣，下着麻布短裤，头戴狐皮帽，赤脚，肩挎兽皮箭囊，手持弓弩。僜人的这种传统装束，在外间人看来似乎有些奇特，但是，照片引人注目的是他身后的一片高耸的雪山，山腰以下的谷地却是莽莽的原始森林，而在人物近旁有几株芭蕉树。这就集中反映出在低纬度高海拔的山谷地带立体气候的条件下，人们的穿着以及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同自然环境保持着一种协调的适应

关系。此外，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能从照片里人们的行为中表现出来，这是图片所展示出的认识功能。每幅照片的背后几乎都有着一个故事，需要我们去认真地发掘。如果一张图片能够记录和反映出多种信息，则它的认识作用更大，研究的价值更高。此外，图片研究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规划、科技文化教育、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新旧事物的对比以及刑侦办案等等都是必需的，它们往往起着重要的参考和实证的作用。

我认为，民族志图片集根据其范围与内容，不外是较全面系统地记录与叙述，或者专门对其中某个方面作深入详细地记录与叙述，即“综合型”与“专题型”两种。因此，编排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这之中照片按内容的恰当分类，每幅照片的“主题词”，一组照片的社会历史及文化背景或属于民族学方面的知识等的“解说词”，则需要运用一定数量的文字来表述是不可或缺的，俾读者能够看懂而有感于其中的文化意义，起到照片应起的认识作用。我想，这应是编辑民族志图片集的基本要求。

本书记录和反映的主要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居大小兴安岭鄂伦春族的狩猎生活方式。我始终认为，鄂伦春族独特的狩猎文化应是人类文化进程的一部分。近期我从当年实地拍摄的650多张照片中选出200余幅照片并加以文字解释编成此集，认为有必要向读者作一番交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正经历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运动，边疆地区一些少数民族滞后社会也在开展“民主改革”，历史上形成的传统生活方式面临着深刻的变化。在这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国家领导人适时地提出了在全国开展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旨在从社会发展史的唯物史观角度，实地了解、记录我国少数民族传统社会形态与现状，为科学研究和制定少数民族政策参考，于文化方面，有抢救资料的意思。这项从1956年开始历时近十年（1956—1966年）有千人参加的大规模民族调查研究工作，其文字方面的成果是：先后编辑出版了少数民族史、少数民族志、少数民族史志合编、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和中国少数民族等“五套丛书”。1957年，电影作为一种形象记录的手段，第一次被运用到这次田野调查的活动中。这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参与拍摄了《佤族》《凉山彝族》和《黎族》三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之后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和民族研究学者合作，陆续摄制了十

余部具有民族志性质的影片，从此开辟了中国影视人类学漫长的探索道路。将近50年前即1963年3—7月，我曾经参与过《鄂伦春族》影片的摄制，这就是当年我拍摄这些照片的背景。

那时我从大学毕业还不到三年，曾在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职，热衷于民族学的田野调查研究。1963年春，该组安排我协助《鄂伦春族》影片的拍摄，可是我对于拍摄电影毫无经验，所幸遇到摄制该片的编导杨光海先生，他是云南大理白族人，长我三岁，非常热情地接纳我参加摄制组。我同杨老师初步交谈后，开始感到田野调查仅仅限于文字的记录和描述可能是不够的，难免有其偏差和局限性，运用照相和电影来细致地显示事物的原状原貌进而充实文字记录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对此我一窍不通，遂虚心向杨老师不断请教。他十分谦虚，说自己对民族学的知识所知很少，为了拍好这类影片，也须向我讨教。我俩一拍即合，在整个的拍摄过程中，经常互相探讨切磋，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和圆满。其间，杨老师一开始就将他随身携带的“莱卡”135相机交给我使用，让我在拍摄的机位旁采取同一视角和视距，拍摄影片中的各种场景，并教我拍照时如何取景和构图，焦距、光圈和速度是多少等。所用的底片都是拍电影的进口胶片，由北京电影学院刚毕业的摄影助理张士美替我剪装底片，最后他拿到北京将底片全部亲手冲洗出来寄给我，让我自己保存，这也是杨老师的意思。这600多张鄂伦春族的照片底片，我无比珍视，它们是我和杨光海先生及摄制组同人友谊的见证，更是我从事影视人类学研究的起点。之后由于工作的变动，我南下北上，一直仔细地保存好这些底片，希望有朝一日能有所用处。

这些照片的内容，基本同于这部民族志影片的结构，即按照鄂伦春族四季游猎活动的方式展开的，内中也有相当数量是在现场及时抓拍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内蒙古境内大兴安岭的鄂伦春族定居不到十年，游猎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还保存得比较多，所以影片大部分场景和我拍的照片多是在内蒙古大兴安岭腹地拍摄的。需要说明的是，影片中有部分场景在当年的生活中业已消失，我们采用了复原的“重塑”（reconstruction）方法进行了拍摄。本书选入的228幅照片中，冬季部分多采用已故的张士美同志所拍以及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往年提供的数张历史照片。本书的编排，主要是根据影片拍摄的进程来做的，既展现鄂伦春族游猎生涯及其文化的特征，

也记录下田野拍摄活动中的一些实际情形。每幅图片下的简短文字是说明其主题，汇集若干幅内容相关联的图片成一组，集中叙述和解释该民族的有关知识。这种编排是将图片和图片内容的文字叙述结合起来，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俾使读者能够从中比较具体地了解鄂伦春族的传统社会和文化的面貌。如果说本书存有遗憾，就是在当年的拍摄中有不少的遗漏，如今时过境迁无法弥补了。事隔半个世纪，当年拍摄的鄂伦春族的许多场景、人物与事物，现今已经很少甚至无法再见到了，我想，这是这部影片和本书历史图片能够提供科学研究的价值之所在了。

卷 首

我国人口较少的鄂伦春族，主要世居于大小兴安岭的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和黑龙江省，地处东经122—131度、北纬48—53度之间，长达1400公里、宽约200—400公里。境内山岭连绵逶迤，河流池沼密布，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兴安落叶松、樟松、白桦、柞树、白杨、榆树、鱼鳞松和杉松遍布山岭各地。地势自东南向西北逐渐抬升，断陷构造十分突出。多布库尔河、甘河、奎勒河、诺敏河、淖尔河自西向东汇入嫩江；呼玛河、宽河、法别拉河、逊河从西往东流入黑龙江。海拔1400—600米。属寒温带大陆性及季风型气候，年均温度在零摄氏度左右，夏季温暖短促，冬季漫长严寒。雨量400—500毫米，集中在盛夏七八月份，无霜期约120天。动植物资源丰富，狍、獐、马鹿、麋鹿、野猪、黑熊、赤狐、猓狍、松鼠、水獭、松鸡、雉、雁、天鹅、野鸭和飞龙等往昔充斥于莽莽林区；野葱、野韭菜、柳蒿菜、黄花菜、杜柿、榛子、木耳、雅格达及多种菌类俯拾即是；大马哈鱼、鲤鱼、鲢鱼、细鳞鱼、哲罗鱼等种类繁多，为鄂伦春族提供了衣食住之源。

鄂伦春族先民17世纪中叶以前主要分布在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及乌苏里江以北，西起石勒喀河、东到库页岛的广袤区域里，和现今同操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的鄂温克、达斡尔、赫哲、满族等先民被清朝统称“索伦”共同游猎于这片广大地区。17世纪40年代沙皇俄国侵略我国黑龙江以北广大地区，大多数鄂伦春人从精奇里江两岸（今俄国吉雅河）带着驯鹿和弓箭扎枪，不断被迫迁移到黑龙江南岸的大小兴安岭居住。崇德年间（1636—1643年）清政府为了固守东北边疆出征黑龙江流域，收抚了鄂伦春人等，建立了臣属关系；康熙三十年（1691年）鄂伦春人被编入布特哈总管衙门的八旗“打牲部落”，选拔其中的青壮年发给枪支、马匹和银饷调集操练，这部分人被称为“摩凌阿鄂伦春”，即骑马的鄂伦春；对于游猎山



家园

林的，由官方“谳达”每岁入山收纳貂皮，这部分人被称为“雅发罕鄂伦春”，即步行的鄂伦春。清廷按其部落和住地的各条河流，将鄂伦春人纳入库玛尔、阿力、多布库尔、托和毕拉尔河共五路管理，每路又设一个或多个“佐”，计八佐，委任鄂伦春人任“佐领”等职。清康熙年间，摩凌阿鄂伦春曾参与了两次与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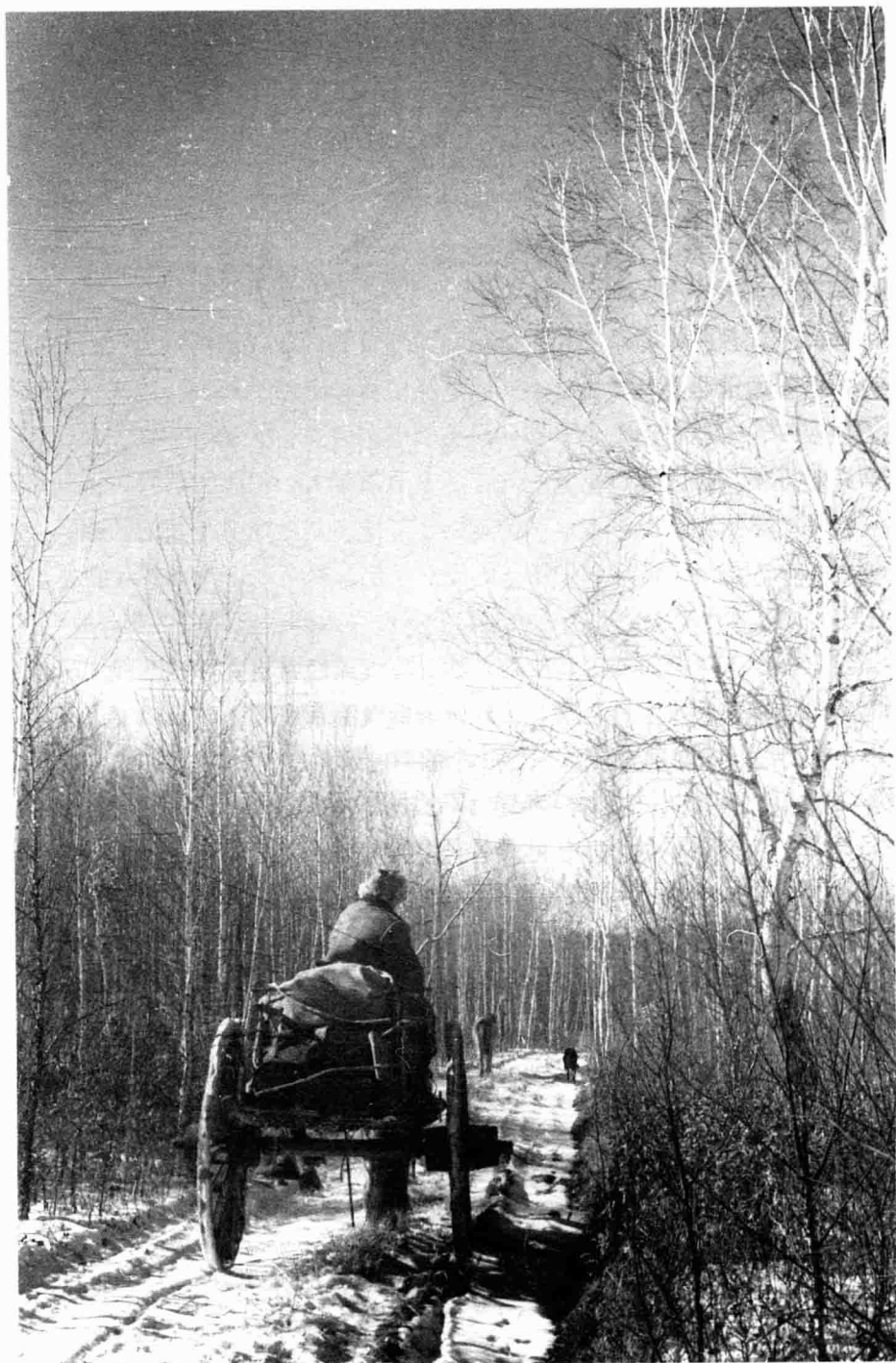
俄交战的“雅克萨战役”（1685-1686年）、1900年的保卫爱辉之战等，其间也曾被调遣到国内西北、东南等地作战，每次战役死亡惨重。动荡的北洋军阀时期，鄂伦春人受尽了奸商的敲诈、盘剥和勒索。伪满时期，各地鄂伦春人被日伪特务机关控制编入“山林队”，执行种族灭绝政策，即不开化其文化，保持其原始生活，实行种族隔离，鼓励其吸食鸦片，大肆掠夺和垄断猎民的猎物等。由于历代统治的迫害和压榨，经年的战争和流疫，至20世纪40年代末鄂伦春族人口由早先的四千多人只剩下千余人。鄂伦春族世代悲惨的生活直到1951年成立鄂伦春族自治旗才告结束。

去朝阳途中

1963年元月，《鄂伦春族》摄制组由北京赴内蒙古自治区大兴安岭鄂伦春族自治旗的定居点朝阳村。之所以选择该村拍摄冬季部分，因为这一带猎民居住较多，附近有讷尔克气和乌鲁不铁等定居点，又是南去嫩江的要道，交通相对方便。时值隆冬季节，这年冬雪虽然不大，但异常寒冷。摄制组里除任翻译向导的莫金臣是本地鄂伦春族干部外，其他成员是云南（编导兼摄影杨光海）、湖南（摄影杨俊雄）、湖北（制片伍远明）和江苏（摄影助理张士美）以及本人蔡家麒等南方人，他们是第一次到严寒的大兴安岭拍片。

兴安岭位于强大的蒙古高压的东部，冷气流经常自北和西北侵入，使这一地区的冬季长达八个月之久。一月份最低气温常在零下40摄氏度以下。有长年不化的岛状永冻层分布。一般积雪深度0.3米左右，稳定雪覆盖100余天，土壤冻结厚度2—3米，河川冻结厚度1—2米，封冻期长达五个月左右。

较早记有鄂伦春族的历史文献是清代的《皇清职贡图》等，本图集收集了三幅图片，其中记有早期鄂伦春人的居住分布及其男女绘像。



隆冬季节摄制组去朝阳的林区小道



《皇清职贡图》中鄂伦春人男子绘像